

#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层累构造及其依据

陈信凌

## 摘要

近十年来国内研究界出现了一股阐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热潮。不过，学者们搭建的阐释框架如同顾颉刚眼中的中国古代史观，是“层累地造成的”。它们没有完满地呈现出西方人心目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质上是中国学者站在中国的语境下，对西方主要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种描述乃至想象，展现出更多的是自己关于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寄望与愿景。西方学者的一些相关性表述，只是成了借以引发思考和感悟的辅佐性材料。学者们的阐释策略是：在不更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典型学术性外观的前提下，通过有意忽略其第一层面的“所指”，增添其延伸性义项，极大地扩张了其表意空间，使它成为一个可以纵横捭阖、快意驰骋的场域。

## 关键词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层累构造、依据

## 作者简介

陈信凌，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电邮：270243872@qq.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4@ZH40）成果。

## The Pile-up Construction and Its Basis of Wester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CHEN Xinling

##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n upsurge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western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in the domestic research field in recent 10 years. However, th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that scholars built is “caused by pile-up”, just like Gu Jiegang’s view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It can’t fully explai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that westerners think about, but is only a description or an imagination of the Western, mainly American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made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It shows their own expectations and vis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 Some western scholars’ relevant expressions are

just the auxiliary material for them to think and feel. What the scholars' interpretative strategy is to overlook the first "signified" level deliberately, to add some extended meanings to expand its ideographic spaces greatly, and to make it a field that can be ramblingly and joyful galloped in the premise of not changing the its typical academic terminology.

### Keywords

wester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The pile-up construction, Basis

### Author

CHEN Xinli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Nanchang University. Email: 270243872@qq.com.

最近的十余年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热词,学术界在新闻学领域的深度性思考大多与它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从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用篇名和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检索,仅在2005—2015年区间内,可以检索到434条记录,其中包括期刊论文379篇,硕博论文45篇,会议论文10篇(吕自珍&李姝婷,2016)。更具说服力的是,从2010年来,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就有十余种,包括:《1998—2008年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戴仙良,黄新宇,2010)、《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戴仙良,黄新宇,2010)、《近三十年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1979~2009)》(刘思文,2010)、《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廖欣,2011)、《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王丹,2011)、《2011年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张薇,2012)、《最近十年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重点与方向》(张薇,2012)、《2012年国内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文献综述》(张雅,2013)、《2012年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李明星,2013)、《2012年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李曼午,2013)、《2012年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叶静,2013)、《2005—2015年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吕自珍,李姝婷,2013)。可以看出,其中有标题完全相同的,有跨越多年展开纵向梳理的,也有评述一年研究状况的,尤其是2012年的综述文章竟有四篇。相较其他学科而言,新闻学研究领域一向显得气氛沉静,节奏平缓。如今在不具特殊背景与机缘,也没有机构与组织推动的前提下,围绕着一个话题展开如此大强度高频率的研讨,使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一个焦点性研究命题,这种现象实属罕见。毫无疑问,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一样,这种现象本身也值得我们展开严谨而深入的探究。

## 一、层累型的构造

在国内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中,有些是径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还有一些则称之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观念”“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信念”“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等等。无论是何种表述,至少在以下两点是达成了共识的。第一,“新闻专业主义”是舶来品,原生于西方,具体说就是美国;第二,“新闻专业主义”具有张力与弹性,是一个理论框架、话语体系。正如有学者视之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社会控制模式”(陆晔&潘忠党,2012),还有人将其描述为“大众传播理念、价值观、操作方法的整个体系”(郭镇之,2014)。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来源明确、含蕴丰盈的表意结构,与此相关的所有讨论,都应该建立在对其展开正面而细致阐释的基础之上。而且,新闻专业主义主要是美国人持有的一个观念系统,当我们要寻绎与揭示其特有内涵时,就应该建立在美国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正面阐述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相关研究中,必须首先直接征引这些学者的相关论述的原文。

但是,实际的情形却大相径庭,出人意料。在我们的现有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为核心词的研究文献中,基本没有直接引用西方学者阐述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对完整的表述。既然没有征引西方学者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系统论述,那么我们的相关研究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意义框架是怎么建构起来的?这个答案是令人吃惊的:学者们在没有提供充分学理依据的前提下,自己身体力行,各自分头建构一个“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观念体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其构造过程与构造机理与历史学家顾颉刚眼中的“中国古史”观的形成有诸多相通之处。

顾先生认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历史,大多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诸多不同的描绘与叙述一层一层累积起来造成的。冯友兰曾回忆到,顾颉刚告诉他,自己在北大上学时喜欢看戏,“看得多了,他发现一个规律,某一出戏,愈是晚出,它演的那个故事就愈是详细,枝节愈多,内容愈丰富。故事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此他想到,古史也有这种情况。……古史可能也有写历史的人伪造的部份,经过写历史的人的手,就有添油加醋的地方,经的手愈多,添油加醋的地方也愈多。这是他的古史辨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是他从看戏中得来的”(冯友兰,2008:328)。冯友兰提到的这个从看戏得来的“思想”,就是顾颉刚于1923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独特创见。“层累”之说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与倾力推崇。钱玄同说:“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胡适

说此一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并且“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

据顾先生自己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代史”观包涵着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是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辟天地的传说。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颉刚，1982：59）。

在顾颉刚看来，“层累”之说的阐释力并不局限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1924年11月23日，他在北大《歌谣周刊》上刊出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可谓是将先前在古史领域的创获推延到民俗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孟姜女故事的原型是说齐侯攻打莒国，杞梁阵亡，齐侯班师时，在郊外遇见杞梁的妻子，便向她吊唁。她不以在郊外吊为然，说道：若杞梁有罪，则不必吊；倘若没有罪，他还有家，所以她不应在郊外受齐侯之吊唁。齐侯听了她的话，便到她的家里去吊唁。在这个节点，杞梁之妻的形象只是一个谨守礼法的人，虽在夫亡的悲痛期，仍以礼处事，神志不乱。至于她在丈夫死之后如何哀伤，在《左传》中未留下任何痕迹。但到了西汉以前却发展成悲歌哀哭；到了《列女传》，受了汉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发展成为哭夫崩城，“却郊吊”一事则不再提起。东汉末蔡邕的《琴操》中更说她“哀感皇天城为堕”，但这时也只说是崩城，没有明说所崩何城；到了西晋，崔豹所著的《古今注》中则明白指称为杞都城，后来酈道元《水经注》又说是莒城；到了北宋，孙奭的《孟子疏》开始提及杞梁之妻名为“孟姜”。由此，作者推导出了自己的结论：孟姜女故事是由《左传》中杞梁之妻的故事发展层累而成的。

现在，我们也不妨将顾先生的“层累”学说延伸到对国内阐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上。由于没有发现西方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正面而系统的论述，我们的学者们就亲身搦管操觚，纷纷陈说自己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的认识与理解。自上世纪末开始至今天，这样的举动在新闻学研究界不绝如缕。大家发摭的意见不免相因相袭、枝桠纠结，但是只要耐心梳理，完全可以甄别辨认出其中的一些具有标示性或者方向性的解读。实际上，在这类解读的字里行间蕴涵着学人共同体对于西方新闻

专业主义的滔滔滚滚阐释大潮的脉络与流向。下面为了研讨的需要，我们学习顾颉刚先生梳理孟姜女故事演化过程关键性节点的方式，把国内研究界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数种标示性的解读，依据演进过程的时间顺序胪列于下：

（一）第一节点，李金铨（1997）《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

媒介专业主义——包括追求新闻的客观性与坚持新闻的伦理道德。

（二）第二节点，郭镇之（1999）《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事实。

（三）第三节点，陆晔，潘忠党（2002）《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话语建构》

西方新闻工作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决定专业特征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功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政治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利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利或权威的控制。

（四）第四节点，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正是实践的不断推动，形成了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专业主义基本理念：第一，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二，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就是政府不能干涉报纸）；第三，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四，报纸的运转时靠自己的有效经



营，尤其是广告收入；第五，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

对这个演化过程进行通观并览可以发现：在其第一节点，主体名称使用的是“媒介专业主义”。从其所处的语境以及征用的例证来看，它与“新闻专业主义”是基本相通的。在这个时候，其意涵仅限于客观性与职业伦理两个面相；在第二节点，增加了服务公众的目标和独立性的立场，客观性仍在，职业伦理则不再提及；到了第三、第四个节点，含蕴的内容更加丰富，涉及面相明显增多。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其所推重的关键义项的强调与突出表达得非常清晰与显赫。这些关键性意向有：独立性立场、公共性平台、专业的自律与自治。这些都是现在国内研究者讨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时，花费笔墨与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由于要突出和强调这些内容，以致于放弃了学者们此前一直比较看重的要素。第三节点提及了“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可以算是与客观性有所勾连，第四节点则对客观性完全没有涉及。

与顾颉刚的相关论述相比照，则这个演化过程完全契合“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代史”观的阐释框架，只是由于“层累”学说针对的是中国古史，移植到新闻学研究领域难免要进行一些适应性的调适与变通。具体而言，对照“层累”学说第一层涵义“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学者们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描述，经历的也是一个由简入繁的过程。越到后期，义项越丰富，内容越繁重；“层累”学说第二层涵义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一点在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阐释中则表现为，时间越靠后，关键性义项越齐备越显赫；第三层涵义是“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现在确实未见到西方人或者说美国人学术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观念体系的模样，但可以知道其在国内学术界最早描述的状况，它就呈现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期的《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一文上。而且，我们还可进一步套用其句式说，我们即不能知道西方人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也至少能知道中国人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我们学术界现在所揭示出来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观念体系，也是“层累地造成的”。

## 二、层累构造的依据

探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观念，其研究的基点应该建立在西方人对新闻专业主义

的相关论述之上，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相关研究到了需要征引西方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论述时，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引述西方社会学研究者关于职业与专业等问题的意见。有人在论文中谈到职业要成为专业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引述了利伯曼关于专业具有八大特征的意见：“垄断地从事社会不可或缺的工作；高度的理智技术；长期的专业教育；广泛的自主性；自主判断和采取行动的责任；为服务为动机；形成综合性的自治组织；拥有专业伦理规范”（王学成，2007）。此外，该作者还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卡尔和凯米斯提出关于专业三个特征的认识；还有学者引述了艾伯特《职业化的理想》中关于职业化、职业主义的标准的意见：“专门化的知识和培训，现身公共服务，自治权利”（朱清河&张荣华，2009）。另有人则提及威伦斯基关于一个职业发展成为一个专业的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即：“第一，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的职业；第二，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形成专业协会；第四，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成立专业协会并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芮必峰，2010）此外，作者还提及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的表述和斯宾塞功能主义思想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中的影响。

第二，征引似是而非的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为了推断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诉求的一个基本理念，《“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一文引用了阿特休尔的意见。该文写道：

“J·阿特休尔将新闻专业主义的信念归纳为以下四点：1.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2.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3.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4.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实际上，文章作者进行了有意误读。阿特休尔是在谈论新闻媒介的思想体系的时候，提出了这四个信念。他在具体引出这四点内容之前明确写道：“即便如此，新闻媒介的思想体系确实存在，它由四条信念构成。”（阿特休尔，1989：133）也就是说，这四项内容是美国新闻媒介的思想体系，而非“新闻专业主义信念”。

显而易见，关于第一种处理方式，其所征引相关论述，离开了新闻业的具体场域谈论职业、专业以及社会分工，完全没有触碰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至多只能说在其外围兜转。第二种处理方式虽然只举了一个例证，实际的存在绝不是孤例，其学理上的不足取，则更无需多言。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提及的这类处理方式尚称得上是迎难而上，勉力而为。其他同类的研究基本上是或者笼统概述，泛泛而论，或者曲意附会，轻巧避过。更有一些径直就铺排堆砌国内学者的相关议论，不加遮

掩地抛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应该是西方人眼中的新闻专业主义这个基本前提。

出现上面的状况，不是因为学者们集体出现行文粗疏、方法欠严谨的等问题，而与本研究特殊难度也不无关联。其特殊难度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的一些关键性元素与环节现在还迷雾重重，一时难以廓清。这一点从深耕此地的三位研究者的甘苦之言中可见一斑。吴飞说：“‘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谁提出尚不清楚。”“几十年来，虽然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信念、伦理和规范的文献日有所增，但至今为止，新闻专业主义的含义仍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吴飞，2009：26/28）。黄旦引述美国海林的意见说：“报刊何时完成这五个转变（指从职业转变为专业）并形成专业主义，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黄旦，2005：6）。童兵则说：“‘新闻专业主义’在美国形成并提出的历史不足百年，但有的学者并不这样认为。有人甚至说世界上第一篇新闻学博士论文就蕴含了‘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童兵，2015）可以肯定地说，这里的棘手问题远不止三位所提及的方面。

其次，在美国学者心中，新闻专业主义或许是不言自明无须辨析的概念，而且也没有蕴含着深潜幽掩的宏旨奥义。连新闻自由、媒体独立都几近常识一般清晰顺畅广泛流播，更遑论其余。因而，它们的存在方式更多的是隐藏在梳理美国新闻发展历程的文献之中，很容易被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与事件所遮蔽。梅林在自己的论著中写道：“独立办刊，尤其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Adolf Okchs）掌管《纽约时报》后基本形成的新闻专业主义信息模式，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1940年代中期，当委员会（指哈钦斯为首的报刊自由委员会）准备期报告时，专业主义得以最大强化。”（黄旦，2005：6/8）迈克尔·舒德森则写道：“李普曼与梅尔兹建议记者接受严格的教育，掌握更多专业知识。他们之所以呼吁新的专业性理念，就在于他们意识到了报道的主观性及其后果。”（舒德森，2009：139）由此可见，他们在使用“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只是意到笔随，信手拈来，而没有条分缕析地求解其微言大义。

最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作多向性的解读。在美国新闻发展史上，报刊应对报道主观化的倾向，采取了两种策略。第一是启用署名栏，署名栏最早只专属于驻外特派记者，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内记者也开始使用这种报道形式。署名栏的运用使记者面对编辑部时有了更大的主导性。另一个应对策略是专业化。迈克尔·舒德森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新闻出现了专业化的苗头，

“《新闻学公报》注意到业界招募药学、外科、卫生、健康等方面的记者。‘也需要记者评论员要有能力将介绍最新车型的公关稿件扔进垃圾箱，自己动笔写出对



新车的见解’。20世纪20年代末期还出现了劳工、科学和农业方面的专业记者。”

（舒德森，2009：131）很显然，这里的专业性指的是新闻专业之外的另一种学科或领域的专门学识，与一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严守专业自治与自律而不能越雷池一步明显不同，也完全是在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预设之外的。

那么，在这样的特殊难度面前，国内学术界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实现对西方新闻主义的解读的？或者说，他们完成解读的基点与依据在哪里？在求解西方专业主义的谜底是，大多数学者都是直接公布自己的答案，答案的出现显得来无影去无踪。也有少数人会在展示答案的前后加入一些说明或注解，无形中给我们留下了他们求解谜底的思考路线和行动轨迹。黄旦在揭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基本理念之前，写道：“正是实践的不断推动，形成了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专业主义基本理念。”

（黄旦，2005：32）此中透露出了这样一层意思：他紧接这句话后面给出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基本理念的五个方面涵义，来源于人们对美国报刊实践发展历史的认识和领悟。

与黄旦的说明稍有不同，陆晔、潘忠党以注解的形式，对自己给出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由来予以更加详尽的介绍。在注解中，两位作者阐明自己概括出来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五个基本原则，来源于欧美学者们对美国新闻史、新闻专业伦理、传媒法律、新闻与传播的运作及效果等方面的研究。作者还特别强调：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面临新的诠释、新的挑战，因此具有话语的历史性，在新闻实践和话语表述变化中不断得以丰富。”（陆晔&潘忠党，2002）潘忠党（2016）在国内几所大学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演讲，将这一层意思表述的更加通透直白。他说：“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且行、且思考、且建构的思想体系和形式逻辑，新闻专业主义类似于爱情的信念与实践，是一个不断追求完善与寻求对话的过程。”

可以肯定地说，黄旦与陆晔、潘忠党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的阐述，是被国内研究者引用最多的两个关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而从他们对自己论述依据的介绍中，结合其他的一些相关情况，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学术界揭示出的西方新闻主义各类模式，实质上是中国学者站在中国的语境下，对西方主要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种描述乃至想象。甚至进而说，在这里展现出更多的是作者们自己关于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寄望与愿景。以黄旦与陆晔、潘忠党为例，他们分别给出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都不是来自于西方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直接论述，而是经由阅览美国新闻发展史等方面的论著等环节之后，基于个人的心

性、识见、立场，最后形成了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概括性描述。在这里，研究者个人的主观状态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至于美国新闻发展史等方面的论著，只是借以引发思考和感悟的辅佐性材料，也就是说在这里不存在必然性与绝对化的答案。陆晔、潘忠党特别补充说新闻专业主义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面临新的诠释，为自己以及同行日后对其展开不断的再诠释预留了无限空间。如果一定要将这种解读方式与往昔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相比附，那么学术界此项研究多数时候距“我注六经”更远，离“六经注我”则近。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的景观。比如，有人认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与政党媒体势如水火，难以相容。但又有人发表宏文，细致探讨新闻专业主义在党报中的种种表现。

第二，研究界揭示出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观念体系，实际上已经与我们常说的“西方新闻理论”<sup>1</sup>的框架大致相通。陆晔、潘忠党称自己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体悟，来源于国外学者关于美国新闻史、新闻专业伦理、传媒法律、新闻与传播的运作及效果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及的这些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是他们确曾从中受益的。依照这样的类举逻辑，此处没有涉及到的新闻学其他面相的研究成果，都可以是他们藉以形成自己推断的资源。那么，这就远远地出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原有轨道，或者说他们已经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框架拉伸到可以把所有相关观念一网打尽的西方新闻理论的程度。实际上，从黄旦与陆晔、潘忠党分别给出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五个方面的涵义来看，都已经涵盖了我们常见的西方新闻理论的主要内涵，只是表述的形式有些差异。当芮必峰对黄旦建构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五个方面的内容删繁就简，并且化约为“客观公正，自由独立，服务公众”（芮必峰，2012）之后，它就与我们常见的高度浓缩的西方新闻理论基本重合了。此外，当有学者将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中新闻媒介思想体系的信念，转换成新闻专业主义信念，表明他心底已经完全消解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 三、余论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时常会使用“新闻专业主义”来指称一种状态或者一种观念，不过，“新闻专业主义”本身一般不会被当成一种可以无限阐释的动态的象征性符号。并且，在美国“专业化”与“专业主义”等词语也非新闻领域的专属品，它们还会很频繁地被使用在其他的专业。威尔·赖特对美国西部片有精深的探究，他认为西部片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经典时期’（其中包括一个被他成为‘复仇片’的变种）、‘过渡主题时期’和‘专业化时期’”（斯道雷，2010：

141) 那么,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就像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气”、“风骨”、“神韵”等语汇一样,看似学术味道很浓,但在使用时则等闲视之,并不深究其本身的内涵。在古人无论是论文还是衡艺的文章中,都可以寻常见到“气”、“风骨”、“神韵”等词语,但是古人并不曾对它们表意体系展开全面的论述。当然,这不妨碍我们今天根据其使用规律,对其涵义进行梳理和总结。但是,这种梳理与总结一定要紧贴其所处语境,扣紧其第一层面的“所指”展开论述。也就是说,即使美国人不曾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入探究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妨将其列为中心词加以研讨。但是,既然是阐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我们不能脱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原有语境,直接宣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内涵。举例来说,专业自治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论述中的关键词,美国学者对其曾有清晰的阐释:“就新闻事业的自治性而言,发展于自由主义社会的专业化实际上具有两面性。它约束了业主,经常用来增强新闻事业的自主权,并限制媒介工具化。但是它也约束了新闻工作者;他们被期待摈弃任何这样的野心:利用他们的地位作为表达其自身政治观点的平台,并服从常规和编辑层级制度规训。”(哈林&曼奇尼,2012:222)。由此可见,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所谓专业自治,旨在约束媒体业主和新闻从业者,但是一些研究者往往跳过诸如此类的表述,直接畅谈自己的认识。甚至还出现如上所述的情形,有一些学者已经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框架拉伸到可以把所有相关观念一网打尽的西方新闻理论的范围。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简略核实一下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情形。当新闻专业主义被一再提及与征引的时候,对其质疑之声也伴随而起。一个具有釜底抽薪效应的挑战是,不承认新闻工作是一个合格的专业,而把它看成是一门手艺。“因为和更具有专业性的医生、律师、会计等职业相比,新闻工作能够被规范化、标准化的部分实在有限。多数新闻工作者是在实践中,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中摸索、试错、领悟而成为熟练匠人的。在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共同体接受的行业规则。因此,作者们认为,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在传统内寻找,而不是通过逻辑推导植入。”(科瓦齐&罗森斯蒂尔,2011:5)与此具有相同效应的是,罗伯特·哈克特与赵月枝的论著《维系民主?政治与新闻客观性》,考察了整个英美传播制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与现实,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性要素新闻客观性展开了深度的反思与质疑,“揭开‘新闻客观性’这一新闻学中的‘不死之神’面纱”,为国内提供了有关北美新闻制度的一种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独到分析。

就实践层面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舒德森视为美国新闻工作专业化的顶峰时期。美国另一位学者丹尼尔·哈林有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记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超级有自信,相信新闻从业者可以兼顾“独立”“不偏不倚”“客观”“为公众服务”“被政府以及全世界信赖”等精神与原则,他还把这一时期称为美国新闻史上的“极端现代主义”时期。同时,哈林又认为记者们形成于“极端现代主义”时期的专业模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它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短暂插曲。当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极端现代主义”所需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之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极端现代主义”时期就永难再现了。(郑保卫&李玉洁,2013)

国内学者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表现出极大的阐述热忱,起初与国内新闻采编框架出现明显的转型密切相关。上个世纪末,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栏目,它们从容而耐心地用事实说话和以理服人,迥异于此前的简单粗疏的政策图解、观念先行、主题直白的报道形态。这种言述方式还出现在《南方周末》《财经》等媒体中,它们同样被学者们屡屡提及。在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同时,这类媒体也给一些视野开阔的学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郭镇之发现,“中国的新闻节目,无论是采访风格还是报道形式都越来越接近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了”,而陆晔与潘忠党则在这里发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实践“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

不妨在此深一步推测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学者们之所以竞相参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阐释,是由于大家都很想陈述自己关于新闻学一些核心性问题的意见。新闻学领域一直被认为是实践性很强的领域,躬行践履的意义总是大于理论建设,与新闻实务关联性不大的学术运思的合法性难免受到质疑。故而,学者们大多有襟抱未展的烦闷与不甘。此外,“西方新闻理论”在我们主流的话语里,已经有了定型化的认识与判断,阐释的空间不大。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恰是一个暧昧且具弹性与张力的语词,准确地说,是一个有开发和挖掘价值的议题。一些研究者便在不更改其典型的学术性外观的前提下,对其内涵进行了技术性的处理。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有意忽略其第一层面的“所指”,增添其延伸性义项,极大地扩张了其容纳空间,使它成为一个可以纵横捭阖、快意驰骋的场域。

(责任编辑:杨雅)

### 注释 [Notes]

1. 这里只是依从国内表达惯例。刘海龙表示在美国找不到新闻理论的踪影,见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2011)。《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译者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比尔·科瓦齐, 汤姆·罗森斯蒂尔(2011)。《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译者前言)(刘海龙, 连晓东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丹尼尔·C·哈林、保罗·曼其尼(2012)。《比较媒介体制》(陈娟、展江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冯友兰(2008)。《三松堂自序》,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顾颉刚(1982)。《古史辨》(第一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郭镇之(1999)。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国际新闻界》, (5), 32-38。
- 郭镇之(2014)。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 中国的问题。《国际新闻界》, (6), 6-15。
- 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赫伯特·阿特休尔(1989)。《权力的媒介》(黄昱, 裘志康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 李金铨(1997)。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新闻与传播研究》, (2), 38-43。
- 吕自珍, 李姝婷(2016)。2005-2015年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新闻知识》, (8), 80-86。
- 陆晔, 潘忠党(2002)。成名的想象: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北)》, (71), 17-59。
- 潘忠党(2016)。新媒体与新闻专业主义: 且行、且思考、且建构。检索于[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TA1MzUzMg==&mid=2654513130&idx=1&sn=ece106f18d12198de48ac58557d65707&mpshare=1&scene=23&srcid=0626YViGrqU23oRySoLzK8a6#rd](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TA1MzUzMg==&mid=2654513130&idx=1&sn=ece106f18d12198de48ac58557d65707&mpshare=1&scene=23&srcid=0626YViGrqU23oRySoLzK8a6#rd)。
- 迈克尔·舒德森(2009)。《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 常江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芮必峰(2010)。描述乎? 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 (1), 56-62。
- 芮必峰(2012)。新闻学研究中功能主义取向和方法之思考——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为例。《新闻大学》, (2), 15-18。
- 童兵(2015)。厘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知。《新闻与写作》, (9), 45-47。
- 吴飞(2009)。《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王学成(2007)。“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 (1), 11-16。
- 约翰·斯道雷(2010)。《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郑保卫, 李玉洁(2013)。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观念发展史评述与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 (8), 78-91。